

浅谈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的核心

赵军先 李竹雪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同志尤为突出。体现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公开发表的主要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考察报告》)。上述两文,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依次而展开。本文试从党的成立起,到大革命失败止,以党的几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有关文献为根据,结合毛泽东同志这两篇文章,说明党是怎样在实践中逐步认识领导权这个问题的。

(一)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社会这一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联合各阶级,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以推翻三座大山。列宁说过:“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分化敌人;‘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①。要联合同盟者建立统一战线,自然就提出统一战线由谁来领导的革命领导权问题。在中国,历史决定了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对联合同盟者的认识,是不明确的,认为党要领导革命,就不能与资产阶级有任何关系,因此,一大提出“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一切联系”^②。一大后的社会实践,使年幼的党很快认识到这一决定是不适当的。觉察到了,就立即改正。未等党的二大召开,1922年6月15日,党就提出愿与“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③。摒弃了排他主义,这是党在认识上的一个进步。刚从法国回来的蔡和森同志,看了这个主张后“虽赞成,但也指出这个文件并未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作用完全表达出来”^④。蔡和森把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加以对比后说,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会有法国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所能起的作用。这说明他对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同年7月,党召开的二大,其中心任务是制定党的革命纲领。但也相应地讨论了统一战线问题。

二大宣言在谈到工人运动时说:“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宣言指出:“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宣言最后呼吁:“中国全体被压迫的民众”,一齐来“和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的工人和贫农共同奋斗呀!”二大的决议案也写道:“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无政府党或基督教所组织的工会里面活动”,目的“是要在他们势力大的工会里面,渐渐积成势力,推翻国民党、无政府党或基督教的领袖地位,自己夺得领袖地位”。这是党在部署在工运中如何争夺领导权

的计划。和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相比，认识上又有了长进。

上述这些认识，犹如一粒落入泥土中的种子，它预示着领导权问题正在萌芽，不久将不可避免地破土而出。

二大后，蔡和森同志于1923年1月，发表了《外力，中流阶级和国民党》一文。他说，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共同仇敌，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也不能得到多大的发展。因此，“从旧的历史看来，领导中流阶级向国民运动走的有中华民国党；从新近的历史看来，领导工农阶级向国民运动联合战线上走的有中国共产党。但今后那一阶级为这个运动中的真正主人，便看谁最忠实于反抗国际帝国主义”^⑤。这就较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应是中国共产党。但由于统一战线尚未建立，所以，这里仅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阶级”。文中对资产阶级的领导未加评述，但却指出今后资产阶级会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联系到他对第一次时局的主张的看法，应该说这里包含了对资产阶级的领导。后来的实践证明，蔡和森同志的预言是正确的。因此，蔡和森同志是我党较早的一个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人。

1923年6月党的三大，中心议题是讨论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这正是为二大提出的建立统一战线寻找具体形式。就在三大召开期间，瞿秋白同志在他主编的《新青年》季刊撰文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文章说：“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所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期然而然突现出极鲜明的革命色彩”^⑥。瞿秋白同志是三大的代表，为什么采取这一方式表述自己的观点呢？这可能和三大的争论有关。以三大的宣言为例，全文仅七、八百字，竟有三处提到国民党应立在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显然，这和瞿、蔡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这种争论又涉及到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看法，可能出于策略起见，瞿秋白等同志才采取这种迂回曲折的方法，用《“新青年”之新宣言》为标题，以类似社论性质的方式，表述了自己的看法。所以，瞿秋白同志是继蔡和森之后，明确提出民主革命应由无产阶级来领导。

1923年5月，共产国际对我党即将召开的三大指示中也提到了领导权一事，指示说：“在建立统一战线时，必须建立工农联盟，工人阶级政党必须掌握领导权”^⑦。但由于交通不便，这一指示未赶上三大的召开，所以三大的宣言和决议都没有反映这一问题。

有的同志说，共产国际这一指示不太明确，是指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还是指工农联盟的领导权呢？我们认为应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因为工农联盟由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二大时已经提出来了。二大决议案说：“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在本党旗帜之下”去进行斗争。因此，共产国际对我党三大的指示，决不会重复二大已经提过的问题。

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三届一中全会，会议经过讨论，作出了三项决定：一，要求党员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在全国建立国民党组织；二，我们要在国民党内占据“中心地位”；三，决定在国民党内建立秘密的党团组织，党团组织的一切政治性言论和行动须受本党指挥。不难看出，这三项决定不仅对党的三大的宣言是个补正，而且提出了在当时条件下，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所以，从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角度来看，三届一中全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过去一般都说党对领导权的认识始于1925年1月党的四大，而三届一中全会却把这一认识整整提前了一年零一个月。联系到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和党内蔡和森、瞿秋白等的论述，这一认识是有其思想基础的。自此之后，党内对领导权问题的论述就逐渐多起来了，认识越来越深刻了。1923年12月，邓中夏同志著文说：“工人群众无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站在主力军地位”^⑧。1924年2月，李大钊同志在纪念“二

七”及追悼列宁的演说中，提出“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⑨。1924年11月，邓中夏同志又提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领袖亦是无产阶级”^⑩。这样，到1925年1月党的四大，全党在思想上对领导权的认识才趋于一致，四大决议说“中国的民族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⑪

综上所述，四大前党内对领导权的认识，是由不明确到逐渐明确，由个别同志的论述到部分同志的论述，最后全党一致，这个讨论的过程，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反复相结合的过程，它孕育着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大地的萌芽。

(二)

党的四大后，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发展。“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是这次革命高潮的开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则为革命军出师北伐打下了基础。面对迅猛发展的工农运动，帝国主义唆使军阀，准备进犯革命；老右派在孙中山逝世后，有恃无恐，加倍反共；新右派阴谋反共，破坏统一战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在复杂的形势面前，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坚持“二次革命论”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张国焘则代表“左”倾错误，否认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使无产阶级领导权成了一句空话。无产阶级领导权面临着严峻考验。1925年1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回答了当时人们所普遍关心的问题。

该文开宗明义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文章指出，工业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它是“有组织的集中”，“特别能战斗”，四年来的罢工运动“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⑫。这是对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最高评价。

文章接着以很大的篇幅分析了其他阶级后，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的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应该说这个结论是相当精当的。在此之前，无论是党的会议，还是其他同志的论述，都无法与此文相比拟。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阶级分析》一文，根据农村中的贫农、雇农所处的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指出他们“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从理论上论证了工农两大阶级联盟的可能性，使无产阶级领导权有了可靠的基础，这是文章的一大贡献。和四大的决议相比，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大大前进了一步。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发，把民族资产阶级分为左右两翼，批驳了党内“左”右倾的各种谬论，从而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为党领导统一战线确定了正确的策略思想，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又一重大理论贡献。所以，《阶级分析》无愧于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的代表作。

近几年，有人说《阶级分析》中没有领导权思想。理由是：作者后来把“主力”改为“领导力量”，他们认为“主力”不等于“领导力量”。对此，我们愿谈点看法：

第一，毛泽东同志当时的革命实践活动证明，这时他在认识上已经解决了领导权问题。从1924年1月至1926年3月，他所担负的重要工作来看，毛泽东同志此时已经参与国共合作的领导工作，一度负责党中央一个部门的工作。这时党的四大精神早已传达到党内，因此，应该说他对领导权是有所认识的，特别是三届一中全会的决议，作为中央委员的毛泽东同志也是应该知晓的。

第二，1926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作了一首词：《沁园春·长沙》。诗人在追忆了青年时代的峥嵘岁月后，联想到当时革命统一战线内存在着争夺领导权问题时，感慨地发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诗中的“怅寥廓”的“怅”字，十分真切地表述了诗人当时深思的情状。这也说明他日夜在思考着这个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领导权问题。

第三，1926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为《农民问题丛刊》写的序言和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⑨。“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这一提法在当时说来是最完善的，就现在看来也是无瑕可击的。

第四，从作者对各阶级所作的分析看，文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字里行间却闪耀着领导权思想。所谓“革命党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就是领导权的含蓄表述。文中虽然没有点出这“革命党”就是无产阶级政党，但从全文看，作者决不会主张由那“半反革命”的中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也不会赞成由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来领导，而只能由“特别能战斗”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五，关于毛泽东同志将“主力”改为“领导力量”的问题。有的同志说这一改动，变了原意，“增加了关于工人阶级领导的问题”^⑩。还有的同志说，把主力说成是领导，“未免有些牵强”^⑪，我们认为提“主力”并不排斥“领导力量”，当时其他同志也有类似的提法。如瞿秋白同志的提法是：“中国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指导者，主力军”^⑫。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干”^⑬。中国无产阶级是革命运动的“骨干”^⑭。周恩来同志的提法是：“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⑮甚至直到1927年初，瞿秋白仍提“工人阶级要以自己为主干，集合农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⑯。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说的“主力”，系指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而言，当时农民运动尚未大力兴起，这时工人阶级既是领导者又是“主力”。这和农民是民主革命阶段的“主力军”，不是一个概念。这里的“主力”，或“主干”或“骨干”，都是领导权的意思。离开具体历史条件，以现在的目光，从字面上去解释，觉得它有些“牵强”，这是毫不奇怪的。但这不是我们研究历史应采取的态度。

既然如此，《阶级分析》在编入《毛泽东选集》时，作者在不违原意的前提下，进行了修改，应该说是允许的。把这种正常的修改，说成是“增加了领导权的问题”，未免有点武断。

(三)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进行的北伐战争，是这个时期的主要战争。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农民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时，帝国主义、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和一切反动分子，恐慌万状，大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等等，为他们镇压农运制造口实。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也指责农运“过火”，提出种种限制。毛泽东同志则认为所有这

些言论和行动都是极其错误的，必须给予驳斥和澄清。于是，1927年1月，他深入到湘潭等县，对农运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考察报告》集中论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首先，农民人数众多，有伟大的力量。中国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是贫农，革命要取得胜利，离开百分之七十这个大多数，是不可能的。作者正是从这一高度出发，热情洋溢地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他指出，一切革命党派、革命的同志，对这场农民运动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面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他强烈要求“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处置，必须迅速变更”。从而反击了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他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要求“每个革命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否则，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这样，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为革命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其次，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农民协会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在有的地方很快就实现了。农村再不是地主豪绅的“天堂了”。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农运前后农村判若“两个世界”。说明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伟大力量。

农运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力量，一靠共产党的领导，二靠革命武装。中国是一个军阀林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人民的武装，便没有人民的地位。早在1923年蔡和森同志就指出：“假使能够鼓起人民武装的自卫和抵抗，使各大城市的市民全付武装或工人全付武装，那么，民主革命没有不成功，封建的武人政治，没有不崩倒的”^①。这里说的虽然还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武装斗争，不一定适合中国情况，但提出建立革命武装这一思想是可贵的。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文章中认为，农民武装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主张通过两种途径建立与发展这种武装。一种是将地主的武装加以改造，放在农民政权的管理之下，归人民所掌握；另一种是建立“农民的梭镖队”。强调要使每个青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这是劳武结合的人民战争思想的萌芽，是实现革命领导权的支柱。

再次，对农民阶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得出结论：富农“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中农有疑虑，但“表现比富农好”。因此，农会应团结他们，多做解释工作。只有贫农，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是农民协会的“中坚、先锋”，成就革命大业的“元勋”。从而提出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农村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的理论根据。这和作者一年前所写的《阶级分析》相比，又深入了一层。

《考察报告》是毛泽东同志继《阶级分析》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又一重要论著。他吸收了彭湃、李大钊、周恩来、瞿秋白等同志对农民问题的论述，根据自己的实践，从理论上论证了工人阶级要求得自身的解放，离不开农民的支持；农民阶级要革命，也离不开工人阶级的领导。工农联盟，相依为命，互相支援，共得益彰。它解决了工农两大阶级联盟的问题，为无产阶级领导权奠定了基础，是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的经典著作。

毛泽东同志的《考察报告》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光辉典范”^②。然而，前几年，有的同志提出疑问，说《考察报告》“是否不恰当地肯定了某些‘过火’行为？”^③与此相联系的又提出了“作为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能不能说从大革命时期就产生了？”^④对此，我们有如下不同看法。

首先，是否有“过火”行为？

(1) 所谓“过火”与否的标准是什么？有了标准才好衡量。革命，一般表现为暴力夺取政

权的斗争。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直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必然遭到敌人的反抗，为打垮敌人的反抗，革命政权采取一些严厉措施，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暴力的表现。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农村进行的土地改革为例，当时为巩固人民政权，人民政府不得不监禁一批反革命分子和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对其中情节特别严重的还要处以极刑。事实证明，这是十分正确的。如果以此为标准，（也只能以此为标准）那么《考察报告》中所讲的给地主豪绅戴高帽子、游街、罚款等，可以说是不足挂齿。须知，地主豪绅为镇压农民运动，不知枪杀和活埋了多少农会会员啊！农民群众给地主恶霸戴戴高帽子、游游街，又算得什么？二者相比，是谁过火？还不一清二楚吗？有的同志可能会举出例子说，某个村当时戴高帽子的多少多少人，游街的多少多少，以此证明“过火”了。我们说这个别情况可能会有的，这是执行政策上的偏差，就整个说来，当时的斗争矛头是直指封建地主阶级的，对富农也只是限制他们，而不是统打击。所以方向是正确的。如果以此证明当时农运“过火”了，那么照此推理，历次运动都可能因个别错误被说成“过火”而加以否定。当然，从维持革命秩序来说，在人民政权下，对戴高帽子游街一类作法，我们不仅不能苟同，而且坚决反对。然而，这里说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破坏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社会秩序，所以非但不违法，又何从谈上“过火”。

(2)《考察报告》发表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其间革命经过许多大的运动，并没有因为《考察报告》中的“过火”行为而出了偏差。今天忽而提出这一怀疑，根据何在？是否就是以“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和打击一大片为根据呢？但是，“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②。它是一场内乱，是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别有用心，并非《考察报告》之过。对此，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也曾尖锐地批评过。

(3)《考察报告》当年一发表，就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恶毒攻击，也受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的指责，说是“过火”行为。彭述之为制止这种“过火”行为，将已在《向导》上发表了一半的《考察报告》腰斩。时间过去了五十多年，陈独秀在历史上的右倾错误，依然是事实，他当年指责农运“过火”的错误说法当然也不能变更。所以，怀疑《考察报告》有“过火”行为是没有根据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其次，毛泽东思想能不能说从大革命时期就产生了？我们认为应该这样说，理由是：

其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党成立后，把马列主义运用到革命实践中，便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一年五月说过：“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③。一九四五年党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头就说：“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当然，幼年时期的党，这种结合还是初步的、试验性质的，认识还是肤浅的，但它毕竟开始了认识和结合，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

其二，毛泽东思想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我们在探讨毛泽东思想产生时，不能不包括党在创建时期，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周恩来等同志对革命领导权的论述，毛泽东思想正是在上述同志的论述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其三，所谓萌芽，“言始有端绪，若草木之始生”^④。从党的成立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从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到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是它的形成时期；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于是毛泽东思想这一

科学概念被人们所认识，终于在一九四三年七月提了出来，继而为党的七大所接受，定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全过程。其中萌芽时期常常不易为人们所发觉，然而萌芽时期却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萌芽，也就不可能发展壮大。这萌芽时期我们认为应追溯到党的产生。

注释：

-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
- ②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
- ③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
- ④ 《张国焘回忆录》（一）235页。
- ⑤ 见《向导》第一集126页。
- ⑥ 《新青年》季刊第一期《“新青年”之新宣言》。
- ⑦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本第392页。
- ⑧ 邓中夏《论工运》。
- ⑨ 载于1924年2月16日《新学生》14期。
- ⑩ 见《中国工人》第二期《我们的力量》。
- ⑪ 见《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议决案》。
- ⑫ “领导力量”，当时的原著称“主力”。
- ⑬ 见《农民运动》第8期。
- ⑭ 见《红旗》杂志1979年第3期《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一文。
- ⑮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见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 ⑯ 瞿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
- ⑰ 瞿秋白（笔名屈维它）《自民治主义与社会主义》。
- ⑱ 瞿秋白《五四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 ⑲ 周恩来《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六次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载《工人之路》特号第37期。
- ⑳ 瞿秋白《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见《六大以前》714页。
- ㉑ 蔡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见《向导》第2期。
- ㉒ 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见《人民日报》1977年9月28日。
- ㉓㉔ 王洪同志《关于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几个问题》。见《中共党史专题报告汇编》（一）。
- ㉕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㉖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 ㉗ 《辞海》509页。

（上接第7页）

明才智。所有这些都是广大人民的共同心声。谁要是不加分析地反对一切人道主义，肯定是违背历史潮流，不得人心的。但是，为了实现我们的共同愿望，就只有用科学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来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用唯物史观来正确地解释、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而不能用任何非科学的历史观来代替唯物史观。否则就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理论上的偏差不会带来实践上的成功。我们应该吸取教训。

注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1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 ③ 鲁迅：《文学的阶级性》，见《三闲集》。
-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8页。
- ⑤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1—76页。
- ⑥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420—421页。